

(429-436 The Millennium's final decade ... but he would first write about China. 29 paragraphs)

全球化时代的自由和秩序

一个世纪的最后十年通常会被称为后冷战时期(POST-COLD WAR)，但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并不是这样的，这十年可以用“全球化时代”来形容。从世界范围来讲，自由民主化提高了，国际交流更为频繁，边界的定义渗透到从科技到疾病及民主化概念等各个方面。

对于那些没有完全调整国家制度使之融会到国际体制中来的国家领导人来讲，这个年代为他们提供了双重性的选择。他们可以选择利用充分的信息和新概念把自己的国家推上世界经济舞台；也可以为了保有牢固的政治掌控，从而导致至少在短时期内的经济停滞不前。

对美国而言，增进全球化的决定是既简单又复杂的。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国际体制，这个体制应该是稳定的、公正的、有益于贸易的、并且是自由的。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并不是笼统的外交途经所能实现的。国际化目标需要各个国家、地区的支持，其中也牵涉到成百项广泛散布在世界各地的事务。包括如何妥善处理美中俄之间的政治关系；如何提升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化；如何更好地与非洲领导消除误解、增进沟通，这些都是促进全球化的重要议题。每一项都牵涉很多人和事。但这一切都将对在新世纪中是否能实现世界大同又或导致世界再次分裂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美国在亚洲与日本的关系是最为重要的。任何人如果对这一点有异议，不妨想象一下，如果这两个国家不是联盟而是对立将会造成如何的局面。早在他们最初尝试与我们建立贸易夥伴关系时，日本已经从多个层次和领域得到了美国的尊重并成为我们值得信赖的朋友。在亚洲与美国关系最为复杂的要算是中国了。

20年前，卡特总统决定要将美中关系正常化时我也在场。我记得当时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提出要改变原有的中央集权经济制度，从而发展私营企业、鼓励外国投资并给工人和企业家创造更多的机会。这些计划的实施使中国繁荣兴旺起来。成千上万的人摆脱了贫困并为市场经济奠定了基础。

但经济上的开放并不代表政治上的开放，邓小平理论的另一部分就是在天安门广场上屠杀关押异议人士，秘密地进行政治操作和坚持一党专政。1992年总统选举期间，当时的候选人比尔-克林顿指责总统老布什对华政策过于宽容。在克林顿就职期间他拟定了一套新的对华政策，别人也对他进行了同样的批评。对任何美国执政党来讲，中国永远是一个特殊的问题--不可以忽视，又不可以全盘接受，同时中国又是那么的自负，很难受到任何影响。

克林顿总统在1997-1998年期间煞费苦心安排了两次美中互访，那时中国的领导人是邓小平的接班人江泽民。克林顿总统希望借此机会打破中国政治镇压的局面。两位领导人在华盛顿的第一次会晤中就建立了颇为良好的私人关系，在准备第二次会晤前，我与江泽民在北京故宫见面。他非常骄傲地向我展示了正在修复中的湖边小屋，他说这将是他和克林顿总统第二次会晤的场所之一。他说他计划在谈论重要政治议题之余，也可在走廊上坐下欣赏音乐，松弛精神。在会议期间中国领导人表现的十分亲切，同时也努力的展示他的世界性。当提到俄国问题时，江泽民还讲了不少英文，在其他场合他也广证博引，甚至还难倒了他的翻译。江泽民温存的微笑时常令我想起切斯海尔猫。

第二次会晤时中国方面坚持要把欢迎仪式安排在记录着许多不幸的天安门广场。这个决定让这次会晤开头就不顺利。因为多种因素我们必须同意，但为了表明我的立场，我戴了白色的帽子，在中国白色代表哀悼。

中国方面为我们准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和音乐会。第一夫人和我拜访了一些法律援助机构，宗教领袖，甚至在上海还参观了一个重建后的犹太人教堂。当然这次会晤的重心还是在北京进行的江泽民与克林顿的会谈。令我们吃惊的是中国方面竟然决定利用政府电视台将此会议的全部内容向全中国人民实况转播。一样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的是，江泽民主席正面地回答了镇压西藏的问题。克林顿总统借此机会提出要求更多的言论自由和宗教解放。当提及中国学生时，他指出政治自由并不妨碍国家稳定而相反正是国家稳定的基础，政治自由能帮助达成公众意愿。

个人外交并不是足够改造一个政府的基本原则。仅仅在会晤的几个月之后，中国就强行镇压了迅速壮大的以精神健康活动为主题的法轮功组织，并关押了他们的一些会员。尽管他们的领导人被监禁，追随者依然进行集会、演讲。中国政府在此时变本加厉地继续进行强权政治，限制宗教自由，侵害少数民族裔的权益。

明显的，冷战结束带给西方一个信息，而带给北京则是另一个信息。我们为民主化的进程而欣喜，中国领导人则感到恐惧，他们意识到要使他们国家的经济繁荣一定要与世界经济融合，但又不能接受更加开放的政治体系，他们至今为止还在试图使之平衡。

美中关系最敏感的问题莫过于台湾问题。美国一向以来都只承认一个中国，台湾只是中国的一部分。然而，美国在政策和法律上都应该向台湾出售武器，这样才能防止北京通过强制军事行动颠覆台湾政权。我们希望中国和台湾能和平解决两岸统一的问题，但可能性不大。中国方面希望我们能向台湾施压让他们接受北京对台湾的定义--如同中国对香港实施的一国二制模式，而我方认为如果不是为了避免一些挑衅性的行为和言辞，我们是不会对本国以外的任何地方施压的。

北京和台北的关系有着很深的历史成因。只要你和中国官员谈及台湾问题他们都会给你上一堂历史课，因为这些历史原因，北京的任何领导人都不会在统一方面做出让步。台湾的领导人也不愿为此负上责任。虽然两者相持的局面已持续了很多年，但双方的关系一直是紧张和不稳定的，并且随时都可能成为世界的焦点。最近几年，中国一直在制造导弹并向其他国家购买潜艇，这些都有可能用于攻打台湾。台湾也在美国的帮助下更新了空军的装备。

在任国务卿期间我五次访问中国，资深的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斯坦尼·罗斯每次都陪同我前往。在多次会议中，我们曾讨论过防核扩散、反恐、人权、开放市场、西藏问题、宗教自由、环境问题、国际犯罪，当然还有台湾问题。我有这样的印象，只要美国反复重申承认只有一个中国，这个会议就算是成功了。对他们而言至今为止，台湾问题还是最主要的问题。

1999年由美国贸易代表巴斯夫斯基签订的同意书可算是我们政权政策的一项最实质性的胜利。此次同意书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铺平了道路。这项契约限制了北京必须遵守各项国际条约，参与国际市场上的公平竞争。为了符合世贸组织的标准，中国需要签订双边协议，即在国内要减少各种商品如电脑、汽车以至谷物的关税。同时中国也享有与WTO其他成员国的平等权力。对美国而言，我们将会给予中国与其他国家相同的贸易待遇。如果不这样做，我们的竞争者将会很容易的从美国手里抢到中国市场。从经济上说，这是个很简单的选择，但要实施需经国会的批准，所以从政治上说这就成了个棘手的问题。

2000年1月10日，克林顿总统宣布无限期延长中国正常贸易夥伴关系，这激发了长达一个月的有关对安全忧虑，贸易利益的争议。很多议员包括自由党和保守党相信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必须与人权挂钩。他们感到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对中国是奖励，但美国不能从中得益，美国反而应该以此为筹码促成中国政治民主改革。

我感到如果要以放松对中国人权状况施压来交换中国贸易市场，我们提出的无限期延长中国正常贸易夥伴关系根本不会被通过。要让大部分美国人在金钱和原则信仰两者中作选择，他们是宁愿坚持原则信仰的。执政党必须向美国民众保证，他们可以在提供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的同时，也绝不轻易在民主人权方面做出让步。我要为此尽一点力。

最近的几年中，在多次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会议上，美国都曾提出和赞成过一些有关解决中国人权问题的议案。无论我们的态度是激烈的或平和的，这些议案总是得不到充分的支持。但不管怎样我们也会坚持自己的原则。

本来美国是有一个专任代表在联合国负责这项工作的，在2000年，由於是否给予中国正常贸易夥伴的争论升级，我决定要亲自去联合国重申我们对中国人权状况所持的态度。那时总统正要出访南亚，我也很想随行。这样一来时间上就有了矛盾，我要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在陪同总统访问完印度的3月22日当晚，我马上乘坐专机来到日内瓦，这也是有史以来美国国务卿第一次出席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会议。长途飞行连续九小时有余，我们中途在克里特岛加油，同机的媒体工作人员和我的参谋们也趁机修

整了一下。

来自五十四个国家的外交官，非政府组织代表和传媒都聚集在日内瓦联合国总部的礼堂里。我的发言有提及了一个美中关系的老问题。中国认为，作为五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显示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彰显，而美国常常忽视这一点。我强调作为常任理事国不单是一种荣耀，同时还要背负很大的责任。中国应该受到各项联合国条约的制约。联合国最近才重申要在全球范围内尊重和保护人权，并签署了有关民主和政治权力的国际联盟公约，除非中国立即采取行动改变人权状况，否则，中国的世界领导国地位将岌岌可危。

当我向与会者指出，中国目前的人权状况没有任何改善的时候，大部分中国代表开始离开会场。我的发言结束以后，中国的代表还大言不惭的坚持中国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也一直充分尊重人权。我的出现，让中国在世界面前只能做出无力的辩护。我回到飞机上，又经过长时间的飞行，最终及时赶回南亚和总统会合，继续访问活动。虽然我们为了解决中国人权问题一再碰壁，但我觉得自己已尽了全力。既支持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夥伴关系，又不在人权问题的立场上让步，对我而言，还是可行的。

2000年5月24日，白宫以237票对197票多数通过给予中国正常贸易夥伴关系。九月，议员更放宽了余地的。中国最终在2001年12月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永久正常贸易夥伴关系也于同时开始生效。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入世之后，中国方面承诺将彻底改造和自由化市场，要从根本做起，改革国有企业，中央计划单位，农业公社，及腐败的官僚作风。这将会为中国开创一个新局面。新科技得以利用，互联网普及，与外国交流增加，越来越多的学院机构可以摆脱中央集权的控制。其实在贸易和民主之间是没有一个明显的交集的，但人们总可以从自己的经验和观察中开辟出新的格局。现今中国的年轻人对经济贸易的敏锐触角已远胜过了他们的父辈。在北京的一个互联网咖啡店里，我看见不少年轻人在购买各种“如何做...”的书籍。人们一旦能自由的获得各方面的信息和知识，再想要束缚他们的思想就很难了。

同样重要的是，如果美国和中国双方都能在参与全球性的政府贸易中获益，我们长久以来的担心还能得到一些平衡。事实上我们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几十年前，毛泽东曾提出过第三世界国家也应该拥有核武器，这才是世界平等。在他的成功领导下，中国加入了反核扩散协议，认可了化学武器公约，也签署了禁止核试验协定。中国反对北朝鲜发展核武器，同时也收紧了对一些敏感科技的输出控制。当然，这些还没有达到我们期望的程度。

如果美国制定对华政策时是基于对中国的未来做出任何假设，那不管假设是正面还是反面的，都将是错误的。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不是用几年或几个十年就可以解释清楚的，他们用几个朝代来计算他们的过去。直至二十世纪前夕，他们才意识到中国并不是世界的中心。西方的战船打破了当时的帝国专制，中国开始面对战争，侵略，内战，共产党执政和文化大革命。现今，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严重衰退了，民族主义复苏，中国的国际地位也逐渐提高。

中国目前还是存在很多问题，高失业率，环境污染，腐败，疾病和从农村到城市的大规模人口迁徙。为了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解决这些令人头痛的国内问题，中国领导人也希望确保比较稳固的国际地位。否则的话他们就会以国际形势混乱为借口，解释造成国内人民生活艰难的原因。

中国的前景将会如何呢？虽然美国拭目以待，但情况绝不会在短时期内明朗化。邓小平曾经说过促进中国与台湾的统一不在一朝一夕，“可能会是持续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任务。”江泽民主席曾预计中国如果保持目前的发展步伐，有望在五十年内成为中等发达国家。

为了更好的发展中美关系，我们必须从长远的角度着眼。世界局势还有很多险峻之处，我们还不急于把中国作为敌人。我们也由衷的希望中国经济改革成功，增加各个层面的接触交流。与中国结盟并不代表为他们的所有行为背书。我们必须履行对台湾的承诺，继续关注武器扩散和人权问题。我们不能任由北京为所欲为。同时我们也会积极致力与北京的新一代领导人合作，努力实现双方利益。

早在150年之前，阿莱可希·迪·特可奇万就曾准确的预言了美俄关系将是形成世界格局的关键。如果他还活在这个新世纪，虽不至于忽视俄国，但我想，他一定会把中美关系放在第一位的。

WAGING WAR, PURSUING PEACE

